

## 异化的先声

### ——《促织》和《变形记》比较谈

叶 晗

(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社科部 杭州 310012)

**摘 要** 中国清朝蒲松龄的《促织》和奥地利现代派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两篇虽然在艺术手法上各有千秋,但却表达了共同的写异化,反现实主题的优秀作品。他们在各自国度开创了写异化的先声。本文围绕异化主题、异化本质、艺术手法三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

**关键词** 异化 反现实 怪诞

**中图分类号** IO-03

中国清朝蒲松龄(1640-1715)集文言小说之大成,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为表现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两位在时空上有如此距离的先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怪异”一词用于表现他们作品的风貌却能显示出两者的共通之处。蒲松龄用唐人传奇手法写志怪,人鬼相杂,幽明相间,故事变幻莫测,境界神异怪诞;卡夫卡则采用变形、夸张、象征的手法使真实与虚构交织,合理与荒诞并列,梦幻与现实交混,作品显得荒诞、虚幻、幽晦。如果说蒲松龄以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超现实事物写现实,从而令人窥视到社会现实的不合理,领悟出人只有处于鬼妖的世界才能发现人的意义的病态,那么卡夫卡则更是以他敏感严肃而又脆弱的心灵顿悟出现代人在金钱、权势等等欲望的诱惑下身不由己地陷入种种“怪圈”的畸形心态。可见“怪异”已经建构了两位大师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一致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度开创了写异化的先声。《促织》和《变形记》就是两篇虽然在艺术手法上各有千秋,但却表达了共同的写异化,反现实主题的优秀之作。

## 1 异化主题体现人性扭曲之悲哀

蒲松龄在《促织》中,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为征缴促织而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从皇帝到抚军,从县令到里胥形成的一股凶狠贪暴、荒淫腐朽的恶势力,建构了一张扼杀人性的专制法网。主人公成名一家在这沉重的精神负荷下,人性的变异令人辛酸。作品主要通过人虫价值的对比来表现人卑虫贵的荒谬。作品开头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虫抵千金,人不如虫的可悲之景已跃然纸上。接下来作者以他精湛的笔墨向人们描绘了人性丧失的图景。

成名是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不仅没有闯过科举考试的鬼门关,而且缺乏应付纷沓世务的能力。

他做里正“百计营谋”不能脱,不到一年就将微薄的财产赔累一空。宫中征收促织,他为人老实,家境贫寒,即“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只好早出暮归到处寻觅。但靡计不施,无计于事。县官“严限追比”,十多天就被打得皮开肉绽,“脓血流离”。后在神灵启示下终于捉到一只俊健促织,不料又被九岁的儿子失手弄死,终于酿成一场家庭悲剧:妻子吓得“面色灰死”,自己急得“如被冰雪”,儿子怕得投井自尽。在成名身上作为人的尊严、意志等已被一连串的打击和折磨践踏得所剩无几。得到一只俊健促织,“举家庆贺”,“备极爱护”,视为连城拱璧;九岁幼子失手弄死蟋蟀,则母斥父怒,被迫投井。身为父母虽然一度“化怒为悲”,但一顾及“蟋蟀笼虚”便又感到大祸临头,“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人命不如虫!成名的命运是被小小的促织主宰的。未缴促织时,经济困窘不堪,肉体备受折磨,精神极度压抑;献虫有功后,时来运转,免除差役,录为秀才,优厚赏赐,成为广有产业,肥马轻裘的豪富之家。可见官场腐败之极。功名不取决于学业,富贵不来源于才干。一只只供少数人玩乐的促织竟有了主宰人生死祸福、休戚荣辱的权威!如果说以成名夫妻为评判对象,人虫价值的对比还只局限于人性的丧失,那么成名幼子因畏惧投井,化为蟋蟀以求将功赎罪之举则已经是人类彻底异化的悲歌。九岁稚子本应该天真无忧,可是父母的愁苦和不幸已经给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如此恐惧、沉重的阴影。人类精神遭到的威吓还有出其右者吗?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描写的是一家公司的流动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后的情景。本来他的父母亲 and 妹妹全靠他挣钱糊口,变形后格里高尔无法上班,后来虫性渐渐增强,眼看无好转希望。全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日益恶化,甚至把他看成是全家“一切不幸的根源”,唯愿他早死。母亲看见他便昏厥,父亲用苹果当武器,打进他的背部,从此没有取出来,更加重了他身体上的痛苦。妹妹原先还同情他,每天给他送吃的东西,后来也腻烦了,提出要把这“怪物”弄走。格里高尔在异化变虫遭到社会抛弃后,又受到亲人们的彻底厌弃,终于在极端的孤独中默默死去。他死后,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人变虫是离奇荒诞的,但是透过“虫”的眼睛,人们看到的却是现实社会里包括骨肉同胞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纯粹的、赤裸裸的功利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揭示出一幅极端冷漠、残酷、自我为中心,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可怕场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在他的《间隔》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地狱就是别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虫后,老板的威胁,邻人的嘲讽、亲人的厌恶,使他在生理上备遭煎熬之后精神上又受重创。格里高尔为人善良忠厚,变形后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去上班,他为不再能养家而自责不已。他默默地忍受一切痛苦和不平,可他最终连一份虫的待遇也无法得到。

人经过漫长的历史从虫进化而来,可谁曾料到在文明昌盛的时代,人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摇弄沦落为虫。自身创造的世界日益成为异我之物。受权势、金钱、功名等等的束缚,人的特性、人的尊严、人的意志横遭践踏。人丧失自我,成为对自己,对别人说来都是异化的分子。于是蟋蟀可以主宰人的生死,金钱可以扼杀所有天良。蒲松龄和卡夫卡以“怪”写“怪”的不朽之作是否可作为敲醒人性的一记警钟?

## 2 异化本质揭示现实社会之病态

《促织》和《变形记》都有人变虫的荒唐情节,表面上看显得怪诞,不合情理。但是两位作者正是通过变形这个象征手法揭示了人被迫成为非人的可悲命运。所谓异化即主体对造物失去控制力并被造物所支配。人变形为虫寓意深刻,是对现实社会之荒谬和病态的强烈讽喻。

《促织》所写的时代是明宣宗朱瞻基当国的宣德年间。宣宗皇帝习好促织,曾有“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的戏语。吕毖《明小史》记载:“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使取之江南,价值至数十金。枫

桥一粮长,以群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sup>[2]</sup>。”上有好者,下必有媚者。作者正是痛感这种皇帝昏庸,官贪吏虐,市风不正,百姓遭殃的黑暗现实才愤然提笔的。

如果说蒲松龄对人性异化的描写主要在于揭示虫贵人轻,人不如虫的荒谬,那么200多年后的卡夫卡则更加深刻、彻底地表现了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日益普遍的异化现象。他普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象活人”<sup>[3]</sup>。卡夫卡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西方社会政局动荡,精神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现代西方人日益感受到无法排遣的孤独、无奈和身不由己的灾难感。作为人的信念已被压抑、恐惧、苦闷所替代。人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中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被迫走向异化。卡夫卡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却用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对现代哲学家对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概括出来的“异化”概念作了完善的表述。这种表述是建立在他自身生存体验基础上的。“奥匈帝国的专制主义统治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的无家可归与受歧视、受压抑的处境,父亲的家长制权威从小对他儿童心理的威胁,社会上法制形式的完整性与法的实质的不存在……这一切都导致他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和异己感,因而无法接受这个世界<sup>[4]</sup>。”卡夫卡心中充溢了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感。他的作品即表达了他本人及现代西方人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感受。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普通人与现代社会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和专制统治在精神上造成的威胁。《变形记》人变虫的怪诞故事深刻反映了小人物难逃无妄之灾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灾祸如解雇失业、亏本破产、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等时刻威胁着小资产者,他们虽然苦苦挣扎也仍难逃命运的网罗。人活着就象虫一样卑微、沉重。人变形为虫意味着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丧失,它是对“非人化”现实的控诉。因此两篇作品虽然怪诞,但都以现实作为巨大的参照系,“寓真实于荒诞”是他俩作品的共同处和强大的批判力之所在。

《促织》和《变形记》都以中下层普通人为描述对象。成名是一个为人迂纳的读书人,格里高尔是个善良、尽职的小职员。他们都正直、善良、老实,都与周围世界不协调。他们清白无辜,却充满了恐惧、苦闷和负罪的情绪。他们对社会有不满和怨怒却处处顺从妥协,苟且偷生。但即使如此,他们最终还是难逃被社会抛弃和毁灭的命运。他们丧失自我的痛苦和悲哀是深沉而有普遍性的。成子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异化人。格里高尔也被誉为西方现代第一个异化人。两部同写异化的作品虽然都笼罩着辛酸悲凉的氛围,但结局可谓一喜一悲。结局处理的不同反映了两位作家迥异的时代背景、美学传统和人生态度。

蒲松龄一生虽然穷愁潦倒,但仍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矢志不移。聊斋虽多写鬼狐却于荒唐中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爱憎。他在书尾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把希望寄托于明君,正如同他所叙写的爱情故事结局多美满一样,虽有不满,有嘲讽、有揭露,但还是心存光明和希冀的。他在成名大祸临头,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既不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解决矛盾的答案,又不愿让无辜的良民陷于困境,只好借助于“志怪”和“传奇”的浪漫主义手法,让成名幼子化为促织进献官府,成名最终否极泰来。把成名的兴衰荣辱置于虫的掌握之中自然是对人的绝大讽刺,但也体现了作者善良愿望和理想。这与中国传统“哀而不伤”、“中和”等伦理观、美学观也有很大关系。虽然能给人以宽慰,却少了分刺痛灵魂的锐利。

同蒲松龄比较卡夫卡则显得灰色得多。他的笔下只有冷漠、孤独、无望、恐惧和灾难。虽然他也希望温情,但最终都是不可得的。他的三部小说《美国》、《审判》、《城堡》被称为“孤独三部曲”,因为主人公几乎全是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环境中备受凌辱,苦苦挣扎。卡夫卡把巴尔扎克手杖上刻着的“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改成了自己手杖上的“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促织》成子的人变虫尽管其中包含了莫大的辛酸,但也成了喜剧的开端;卡夫卡的人变虫则是一切悲剧的起点。忧郁、

孤独、绝望的情绪贯穿全文。《变形记》中所写的异化现象较之《促织》则更为深刻、彻底,这表明卡夫卡较之蒲松龄对人的失望也更大。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悲哀。

社会化机器生产的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威胁,人类不知不觉地由生产体系的支配者变成被支配者。仿佛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金钱、机器等“物”操纵着人的命运,人成为“物”的奴隶。人的自我失落,生存陷入困境。异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由来已久的重要主题。但传统作家在表现人的异化时,理性的光辉始终没有泯灭。他们虽然找不到人性复归的正确途径,但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而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异化强大的力量已使人沦为甲虫、机械、毛猿。格里高尔的命运反映了人类的困境和生存环境的荒诞,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对人性的绝望感,蕴含着对社会的厌弃和否定。这种揭露和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不可谓不深刻。《变形记》采取一种“神话模式”用现代人模仿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奥维德在《变形记》中神通广大,随意变化的神祇变成了卡夫卡笔下丑陋的任人摆布的甲虫。非英雄化的人物形象强调了人在荒诞世界面前的微不足道。因此《促织》和《变形记》两部作品同一主题不同结局的处理亦可窥探出传统作家和现代派作家对现实社会迥异的态度。

### 3 同中有异,各尽其妙的艺术表现

《促织》和《变形记》在艺术上虽然都有怪诞、夸张、超现实等共同特征,但两者的艺术追求和表现手法可谓同中有异,各尽其妙。

蒲松龄的聊斋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观。他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以来以狐鬼和幽冥等超现实事物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传统。《促织》除结局成名幼子化虫救灾为理想主义情节外,从背景、人物、情节等都是现实的。卡夫卡作为现代派大师强调表现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下意识。他虽然主张艺术反映现实,但绝不是再现,而是通过主观感觉表现客观的外部世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促织》是现实的写实的产物,而《变形记》则是主观外化的结果。人变虫通过扭曲人的外部形态,把人从人的世界中孤立出来,这种扭曲使作者所要强调的主观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与蒲松龄不同,卡夫卡不注重环境的写实和性格的刻画,他借助象征手法使内心体验和观念具象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再现,《变形记》是现代人的心灵史。通篇作品不是如《促织》描述一个典型事例,而是表现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深刻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

因此在故事情节结构的展示中《促织》紧张曲折,变幻离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结构缜密,环环相扣。短短一篇小说三伏三起,惊心动魄。一开始成名无力缴纳促织,身心交病,陷入绝境到其妻请巫问卜,按图得虫,绝处逢生。但成子失手毙虫,畏惧投井,成名二度陷入绝境。再后成子化虫,故事发生转机。但仍曲折多变,成名两次验促织都险象环生。《变形记》虽然离奇、怪诞,但故事性不强,情节似有若无。主要写格里高尔变虫后家人对他的态度及其他人的内心悲苦。人物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是静止的。唯有内心感受绵绵不绝。结构也是一种心理流程式的结构,具有多层次性,以适应表现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的需要。

在心理分析方面,《促织》精细入微,复杂多变。成名得知幼子失手毙虫后,浑身“如被冰雪,怒索儿”,后知儿子投井自尽,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儿子半夜复苏转悲为喜,但看到“蟋蟀笼虚”,想到征敛压力又“不复以儿为念”;及听到“门外虫鸣”才又“愁云消散”“喜而捕之”见其“短小”又“劣之”,后见其似属上品又“喜而收之”,但“将献公堂”恐不合县令意,又“惴惴不安”。《促织》这种乍悲乍喜、时怒时忧的心理描写可谓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说《促织》的心理描写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技巧,那么《变形记》作为一部人类的灵魂曲,心理刻画已是全书的主干。它大量采用意识流

手法,靠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把处于孤独无助状态的“虫”的内心写得淋漓尽致。作者不象蒲松龄那样介入作品,而是隐身于作品之外,让主人公自由地抒发情感,倾诉心曲,把读者带入了真实深刻的情感体验之中,审美主客体保持了情感的一致性。

### 参 考 文 献

- 1 萨特. 萨特文集. 秦天, 玲子译.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 134
- 2 吴组缃等著. 聊斋志异欣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262
- 3 骆嘉珊. 欧美现代派作品选.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6
- 4 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5
- 5 蒲松龄. 聊斋志异·促织.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151

## Herald of Alienation

### ——A Constructive Study of Cuzhi and Die Verwandlung

Ye Han

(Hangzhou Institute of Applied Engineering,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 Cuzhi by Pu songling, a Chinese short story writer in Qing Dynasty, and Die Verwandlung by Franz Kafka, a modern Austrian writer, are two famous stories with alienation and anti-reality as their themes. They're both the heralds of alienation in writing.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theme of alienation, the essence of alienation and the artistic skill through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two stories.

**Key words** alienation anti-reality weird